

章太炎与中国社会学

林闽钢 李保军

内容提要: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中的卓越思想家,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启蒙旗手。本文追叙章太炎社会学思想变化的轨迹,从而展示章太炎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因慕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别名太炎,后以别名著称。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早年曾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并作为“拉车向前的好身手”而为世人所推崇。他一生著作甚丰,涉猎广泛,如政治、经济、哲学、佛学、史学、文学、经学等许多领域,而且“渊博精深,尤为世所举及”。作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中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对社会学极为重视。1898年他与曾广铨合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部分,出版了《斯宾塞尔文集》;年末,又编著成《书》,次年冬付梓;1902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翻译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汤志钧,1979)。由此可见,章太炎在把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启蒙的旗手。

一、时代的选择:章氏的思想道路

章太炎这一代人倾心于西方新学,大多以甲午战败的沉重刺激为契机。在此之前,他们的前辈即使有意于此,也必须要有甘冒不韪的勇气和遭受困阻的决心。巨大的甲午风云把中国进一步推入半殖民地苦难深渊的同时,也使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扫除了顾虑。章太炎就是从这时睁眼正视西方并寄希望于“师夷之技以制夷”的。

章太炎和许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都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学习,但章太炎的思想成长又具有自身独特之处。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一方面师从俞樾刻苦治经;另一方面狂暴袭来的“欧风美雨”又刺激他关心国事,留心时务。知识分子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汤志钧,1979)。这是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对知识分子出路所作的概括。但章太炎并没有走以上两条道路,他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应时代要求,把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兼收并蓄,改造制作,为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唐文权、罗福惠,1986)。但这样一个东西文化融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那种新旧事物剧烈变迁,政治斗争尖锐展开的的繁忙动荡的过渡时代里,章太炎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思想,有时只能是“应一时之需”而倡导某种思想,这就必然导致他的思想前后变化很大。

二、社会进化论:章氏社会学思想的原点

甲午战后,西学以很高的势头涌进中国,章太炎采取“迎就”态度。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

会演说辞》中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章太炎，1957a）。当时的知识分子欲救中国，他们反对顽固守旧向后看，而要“法后王”向前看。在这种要求下，西方进化论思想应其所需，被迅速地引进过来。1895年，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向国人敲响救祖国于危亡的警钟。该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影响一代人的名著。章太炎对进化论也情有独钟，1898年由曾广铨口译，章太炎笔述节译了《斯宾塞尔文集》（《社会学原理》），这部文集的第一论即《论进境之理》，他认为要重视西方“新理”，注重社会“进境”，从中可见章太炎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青睐。这部文集是章太炎接触西方社会学的开始，斯宾塞书中的观点深深影响着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这种影响在他的同期重要著作《书》中有明显的表现。

《书》于1899年编辑成刊并在苏州付梓，它距《斯宾塞尔文集》的出版仅有一年。《书》中社会学论文约占篇目的1/4，有许多社会学观点同《斯宾塞尔文集》中相同或相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人类起源上。章太炎认为人类是进化而来，先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再从简单生命物质到人类，在《书·原人》篇中，他对人类起源作了以下的解释：“赫石赤铜箸乎山，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藪泽，果然 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眈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大之鳞也……”，在这里章太炎概括了人类起源的经过：人类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水生的生物，后来进化为猿类，又由猿类进化而为人。这里显然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

第二，在种族的进化上。章太炎说：“化有早晚而部族殊”，他认为人类种族同为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差异。而文化的高低是区别不同种族的依据。“性有文犷而戎夏殊”企图以种族的不同与文化的差别，来论证汉民族不应当受民族的统治。章太炎把汉民族说成与欧美人种一样同属于文化发达的人种，以此激发民族自信心，反抗外族的压迫。

第三，从个人存在方式上。章太炎一再强调“合群”的重要性，“益州之金马，碧鸡”，为因“踽踽以丧群，而亡其种”，现在只存化石了。在物种竞争中，只有合群，用“群”的力量去斗争才行。他说“知群之道，细若贞虫，其动 有，有部曲进退，而物不能害”（章太炎，1984a），可以看出“群”的力量对于“种”保存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在亡国灭族的紧要关头，也要发挥“群”的力量，因此章太炎坚持反对逃避现实斗争去隐居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会把人民带到“野蛮状态”。

第四，在社会分工职能上。斯宾塞是著名“社会有机体论”的倡导者，他把人类社会视为与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进化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具有供给、分配和监督三大系统。章太炎很赞同这些观点，他引用古代部落斗争来说明“社会有机体”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他说“胜者常在督制系统，而败者常在供给系统”（章太炎，1984b）。他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如西方先进，因此必须加以改进。

第五，生产工具在人类进化历史的作用上。章太炎认为人类在生存竞争中使用的手段是工具和武器；“人之相竞也，以器”（章太炎，1984a），章氏“相竞以器”的观点来源于斯宾塞，斯宾塞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需要不断扩大和多样化会促进生产工艺的进化，随之生产工具也会不断改进。章太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生产工具的改进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志，“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章太炎，1984a），轩辕时“以石为兵”，黄帝时“以玉为兵”，禹时“以铜为兵”，之后则“铁作兵”，人类社会的进化与生产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思想成为章太炎社会进化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第六,礼仪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在《斯宾塞尔文集》后半部分的论题为“论礼仪”,文章以丰富的材料论证礼仪发展变化的历史。“礼仪之始,莫不始于敬神服强”,“未尝非良法美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渐生,有力者必当拥护其弊而后可以利己”。“人之知识愈开,则旧律自废。今世情渐变,后日必要有大变。”章太炎稍后在自己的文章几乎是复述了以上所言:“竞以器,竞以礼,旨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礼仪乃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相应发生变化,而礼的形式必须与社会生活的内容相符合,否则便当废弃不用,“名实既诡,则皆可废”(章太炎,1984a)。

此外,章太炎还在人口、婚姻家庭等方面有所论述,例如他反对近亲结婚、早婚、提倡优生,主张废妾……,章氏结合中国一些社会问题阐述了他的有关社会学思想。在《书》这一时期,可以看出章太炎受斯宾塞影响很深,由此建构了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这是他早期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双重不满:章氏社会学思想的取向和形成

《书》付梓后,由于义务团运动的掀起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他认识到清政府的卖国本质,章太炎的思想由维新逐渐转为革命,并“割辨明志”。后因宣传革命而被迫走避日本,在第二次赴日期间,他购得大量西学书籍进行钻研,后于1902年7月回国。在这一段时间内,章太炎思想发生了转变,并导致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的翻译出版。这本《社会学》是我国全本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的第一部,也是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思想,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书》初刻本编定前,西学中给章太炎最大影响的是进化论学说,那么在这一阶段,给章太炎最大影响的应该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过去他虽然已开始接触到斯宾塞等人的学说,但是并不很深入。他对西方社会学较为深入而广泛的接触,主要是在第二次流亡日本期间。当时日本社会学非常兴盛,斯宾塞的各种社会学著作一一被译为日文,而日本国内社会学奠基人有贺长雄当时也有许多著作出版。

章太炎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斯宾塞、有贺长雄以及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等人的著作,读后“颇感触”,特为报告友人(汤志钧,1979)。章氏开始不满足于斯宾塞的进化论观点,他引用赫胥黎等人来反对斯宾塞,指出进化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举社会现象为证……进化论始成,同时即有赫胥黎氏与之反对”(章太炎,1957b),章太炎认为斯宾塞用生理、生物观点而不以心理意识观点来解释社会是有缺陷的。他说:“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始杂心理,援引洁穰,于玄秘说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议论,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匱于知来者”(章太炎,1984c)。

因此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斯宾塞的不满,章氏转而仔细研究了吉丁斯(F. G. Giddings)的社会心理学说。当时吉丁斯所著的《社会学大学教科书》和《社会学》已分别由前川万九人、远藤隆吉译成日文,章氏在读后对书中观点很感兴趣,他说:“美人葛斯哥斯(即吉丁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优于差别觉,制胜于模仿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云。’故葛氏自定其学,宗至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章太炎,1984c),从中可以看出章氏观点已开始出现转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转向吉丁斯,在章太炎看来吉丁斯的理论也有其片面性:吉丁斯认为人们有一种所谓“同类意识”,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因素,而社会实质上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同类意识”中(章太炎,1984c)。在对斯宾塞和吉丁斯都有所褒贬的基础上,章氏最终转

向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他说：“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日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当偕动，率其所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章太炎）他以为，岸本能武太综合了斯、吉的观点，各去其弊，能把社会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避免了斯宾塞用生理现象机械地解释社会活动的弊害，也纠正了吉丁斯把“类群意识”的作用绝对化的偏向。正因为岸本之书综合两家所长，既取了宜古的斯宾塞之言，又采取宜今的吉丁斯之说，所以被他赞为“学理交胜。”（汤志钧，1979）

因此他回国后不久便将岸本能武太的这本《社会学》译成中文，交广智书局出版。章太炎认为岸氏《社会学》中有关社会进化的观点可以用来驳斥泥古不变的封建学说，这也符合当时资产阶级要求革命的政治目的。

章氏要“达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之学，为的是从中寻找“学理”，寻找“进化之理”。章太炎所指的学理与进化之理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社会学》绪论第六节《社会学之定义》中说：“社会学，先研究现在，过去之社会，而发现其要素、性质、起源，发达与其目的，次论组织社会之个人，将来以何种方法促进社会之进化，贯彻人类生存之目的，此所以为社会学也”，从中可以看出章氏翻译社会学是为了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用来自指导将来促进社会之进化。这就是章太炎译述岸氏《社会学》的另一个原因。

从1898年出版《斯宾塞尔文集》到一年后出版的《书》，再到1902年出版的《社会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章太炎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早期崇尚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转而注目于吉丁斯的社会心理学，之后发现两者都有缺陷，最终取向于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中的综合思想。

四、启蒙旗手：章太炎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第一，章太炎在把西方资产阶级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丝毫不逊于严复。严复于1897年为《国闻报》译出了《群学肄言》的前两章，比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早一年，可谓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社会学的人，但章太炎全文翻译的成本著作《社会学》反过来又早于严复的《群学肄言》一年。因此从译著的时间先后来看，严复略早于章太炎，而要从所译书籍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来看，严复则不如章太炎早。更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是把西方社会学中心理学派思想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同严复一样，他也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比较早地介绍到中国，但与严复不同的是章太炎渐渐不满于斯宾塞的学说，故在1902年翻译了岸氏的《社会学》，因此，章太炎事实上是把社会心理学派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此外，在翻译方法上，虽然章太炎和严复都采用取“达旨”的方法，但是章太炎译书是为了警世之需，借外人之书，附着中国国情，发抒自己的意见，这种“为我所用”的思想贯穿于译文始终。“为我所用”一方面体现了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启蒙思想，振奋人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他也能将中西方在文字上融合起来的功底。但也许是他抑旧扬新的思想和取便发挥的方法太过“自由”了，因而引起严复的不满。严复在1903年所译的《群学肄言》中，以“译者注”的方式对章氏所译《斯宾塞尔文集》加以“纠正”，强调斯宾塞本意说维新与革命各有偏颇，唯有“群学”方可补救双方之失，“息新旧两家之争”。很明显，严复仅仅是一个维新与革命的调和者，而章太炎则是革命的拥护者，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严、章两人的思想差距。

因此章太炎在把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的事业中丝毫不逊于严复，而把严复作为中国社

社会学之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应将章、严两人并列在中国社会学的起点上。

第二,在“社会学”定名的问题上,西方社会学在被介绍到中国之初有两种名称,一曰群学,一曰社会学。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都是“群学”的使用者,他们大倡“群学”而不言“社会学”,目的在于鼓励中国人团结起来,抵御外国的侵略,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不能长期使用。“社会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源于谭嗣同1896年所著《仁学》,但他所作的工作仅仅把社会学这一名词和其他学科作了一个列举,“凡为仁学者……于西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并没有说明所提及的“社会学”的具体内容。因此谭嗣同仅仅是这一概念的最初引用者,而章太炎则中国给社会学下完整的定义的第一人。他在《社会学之定义》中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组成社会的各要素,并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然后用此规律指导对未来社会的改造。在此之前,还没有如此完整和精确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出现过。如果把这个定义和现在的社会学定义相比较,会发现它们具有惊人的相似处。

此外,章氏以其在翻译界拥有很高的权威和声望。因此他把所译岸本能武太的书定名为《社会学》,对社会学的最终定名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02年12月1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介绍新书》栏,介绍《社会学》译本时说:“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约,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可称译界一明星乎?据韩明谟在所著《中国社会学史》中所举,中国在社会学发展初期所译的世界著名社会学著作共19部,译者共29人(其中有两人同译一本书),其中有25人次把其所译的书冠以“社会”字样,可见章氏把社会学定名为“社会学”,很快得到许多早期社会学者的认可。

从更深层次的层次上说,“群学”的定义仅是一定时代的需要,且其内涵极狭窄,如严复在定名时说:“犹荀卿言人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可见他仅仅将人与人的一种组群性作为“社会学”的内涵,较之章太炎社会学定义,则显示出其局限性和非科学性。因此,最终把社会学定名为“社会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符合科学的客观要求。

章太炎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启蒙者,他的许多社会学思想是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同时也推动中国社会学不断向前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倡导社会学的旗手。

参考文献:

- 汤志钧,1979,《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 汤志钧,1977,《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
- 唐文权、罗福惠,1986,《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章太炎,1984a,“书·原变”,《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太炎,1984b,“书·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上海人上出版社。
- 章太炎,1984c,“社会学自序”,《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太炎,1957a,“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 章太炎,1957b,“俱分化论”,《民报》第7号,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作者林闽钢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保军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范广伟